

国别与地区

德国经济与“德国病”

殷桐生

【摘要】近20多年来,德国经济一直在低增长中徘徊,这同50年代和60年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美国经济学家将此归因于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体制,并称之为“德国病”。作者同意这一结论,并在第一部分进一步分析了其症状,认为主要表现在“五高两低”上:即高福利、高劳动成本、高国债、高税收、高失业和低投资率、低增长。在第二部分作者集中阐述了治愈“德国病”的难度和可能,指出关键在于把握好改革和转轨的根本规律,冲破德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和社民党自身矛盾的严重制约。

【关键词】德国病;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社会福利市场经济;改革;转轨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1)02-0066-69

200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3%,创德国统一十年来的最高纪录。执政的红绿联盟自然是喜不自禁,业内人士则更多在思考,这是“德国病”转机的预示,还是阵发性的起伏,抑或是回光返照?

“德国病”是美国经济学家在分析近20多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德国(和以其为代表的一批西欧重社会福利的国家)的经济在低增长中徘徊时使用的一个概念,令德国人既感到羞辱,也感到愤慨,但在冷静思考之余,又感到不无道理。

一、“德国病”的症状

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全境一片废墟。然而只经过了短暂的数年,从这片废墟中便出现两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德国,于是世人惊呼这是“金色的年代”,“银色的年代”,是“经济奇迹”,并以此为据,声称“德国已经找到了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钥匙”。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联邦德国就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1973-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经济危机,联邦德国虽然受害不重,却

也未能幸免;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联邦德国亦是伤痕累累,最终导致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赫尔穆特·施密特领导的社民党政府倒台。可以说德国经济此后虽有起伏,但始终走不出低速增长的怪圈。“魔力四边形”中规定的4%标准值也从未再达到过。原因何在?

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问题出在体制上,出在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体制上。1776年“国民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深入阐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从而开创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先河。^[1]之后,经过200多年的沧海沉浮,从单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已经派生出四大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即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日本的“政府指导型市场经济”,瑞典的“福利国家市场经济”和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其中尤以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德国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核心问题是社会福利应在经济发展中占何地位。

德国自1871年统一以来,经过不断的完善,逐渐

建成了一套令世人为之瞠目的社会福利体制；二次大战后，艾哈德、阿尔马克等人在德国经济学家欧肯领导的弗赖堡学派的“奥尔多自由主义”理论上，经过对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和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利弊权衡之后，决定继承重视社会福利的传统，扬弃美国在此领域的弊端，正式在市场经济中把社会福利置于重要地位，决定建立社会福利市场经济。^[2]经过50多年的风风雨雨，该体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也暴露出很多问题，特别是从1969年社民党执政以来，社会福利急剧膨胀，严重制约了德国经济的发展。1982年科尔政府上台后，原本想反其道而行之，削减高额福利费用，然而由于积重难返，更由于削减福利将影响芸芸众生的切身利益，于是不得不打消改革的初衷。结果是，福利费用有增无减，经济依然只能在低速中徘徊。1993年整个德国和原西部地区竟然都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负增长（分别为-1.2%和-1.4%），从而招来了国内外一片更为激烈的批评，但多数人仍然抱住现行的福利体制不放。据统计，1994年67%的德国西部居民和85%的德国东部居民均表示反对触动现有的社会福利支出。^[3]

面对这一形势，德国媒体自然不甘寂寞。1997年，在“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新闻周刊》便组织力量就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问题进行了一场民意调查，结果是十分令人悲哀的：这个一向让德国人引以为荣的经济体制，在1994年时尚能获得53%居民的“好感”，而到了1996年这一比例便大幅度地下降，仅有40%；相反，对该经济体制不抱“好感”者却从23%升至29%。1990年德国统一时，东部地区的德国人对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抱有“好感”者高达70%，不抱“好感”者只有5%，而到了1997年，前者下降到24%，后者则上升到41%。更令人悲哀的是，参加调查者认为，即便在10年以后，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经济形势势必每况愈下。耐人寻味的倒是，人们普遍认为，10年前市场经济成分同社会福利成分几乎均衡，而在这10年中，前者的比重日益增大，后者的比重则日益减少。半数以上的人认为，10年后前者将明显超过后者。

结论很清楚，“德国病”病在体制上，病在德国实际执行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这一体制上。其症状如何？根据笔者的看法，主要表现为“五高两低”：即高福利、高劳动成本、高国债、高税收、高失业和低投资率、低增长。

福利的高低主要反映在国家的福利费率上，也就是说，反映在国家支出的福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从1871年引进福利体制开始到1974年为止，德国的福利费率从1%上升到30%左右。1997年德国西部的福利费率为31.9%，东部则高达55.6%，整个德国为34.7%。1999年全德的福利费用高达1.7万亿马克，与1990年相比整整翻了一番。

如此高的福利费主要是用在高额附加工资费上。据统计，1996年德国制造业中人均劳动成本为8.62万马克，其中直接工资为4.74万马克，占总成本的55%，附加工资为3.88万马克，占总成本的45%，是美国和日本的2.5倍。^[4]高额附加工资必然导致高额的劳动成本。根据1993年的统计，德国每小时的劳动成本为25美元，而日本仅为18美元，美国17美元，英国14美元，韩国6美元，波兰和匈牙利仅为5美元。面对如此高额的劳动成本，德国国内投资不振，德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福利费的另一支出大户是养老金。由于人口日益老化和养老金的不断提高，德国面临严重的养老金问题。60年代初当德国提出动态养老金体制时，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平均不到10年，到1993年已上升到16年，如今还在继续上升。同时，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比例不断恶化，而且还将进一步恶化。1993年100个在职人员只供养36个退休人员，到2040年该比例就要变成100:70，就是说100个在职人员要供养70个退休人员，而在国家公务员中该比例则要高达100:93。

根据路易斯的经济理论，一国的资产状况会极大地影响该国的经济发展。而德国为了支付上述高额福利费用不得不大量举债，从而恶化了自己的资产状况，制约了经济的增长。据统计，1982年科尔接替施密特任联邦总理时德国的国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国债）总计为6000亿马克，到1998年政府更迭时已上升到1.5万亿马克，每年需支付的利息为830亿马克，相当于整个税收的1/5，是联邦政府第二笔最大的开支。1990年德国的全部债务（指总债务加上无担保的退休金负债）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3%，而美国仅为151%。^[5]

在资本主义世界，政府的财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前面谈到的借债，另一个则是征税。为了支付高额的福利费，国家不得不再提高税率，例如1997年德国的税收就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3%，德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53%，企业税为51.83%，工资收入的最

高税率为47%,公司留成利润税率为43%,起征税率为25.9%,这在发达国家均列在高位。例如同期美国的税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7%,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30%,企业税亦仅为30%。^[6]高税率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它挫伤了企业、个人的生产和投资积极性,迫使纳税大户外迁或将投资转向国外,也使偷税漏税和打黑工盛行。

众所周知,福利和就业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当前,德国失业情况十分严重,进入90年代后,登记的失业人数已经三次越过400万大关。2000年仍无大转机,当年全德的失业人数共计390万,失业率为9.6%。如果加上备用劳力,加上正在接受培训或改行培训的人员,德国的失业人数仍然超过700万,接近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时的人数。据1996年纽伦堡劳动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统计,因失业造成的额外负担高达1590亿马克,人均4万马克。导致德国如此高失业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高福利。例如:当前德国的每个失业人员一般可以领到67%的失业津贴或57%的失业救济。他们完全可以依此体面地生活下去,如果再能打点“黑”工,收入甚至不会低于就业时。因此他们并不渴望重新就业。一位经济学家不无感慨地对笔者说:“现在德国政府连雇佣失业者来清扫冬天积雪的本事都没有,大冬天的,谁愿意离开温暖的家,跑到这冰天雪地的世界里来。”

造成高失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作岗位的过度保障——解聘保护。当年引进这一举措本是为了保护雇员免遭无端的解雇而失业。按照《解聘保护法》的规定,企业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可以解雇职工:一、职工个人的原因,例如失去了劳动能力;二、职工的工作态度,例如不愿干活,或不愿好好干活;三、企业的原因,例如企业某一部门关闭或是倒闭。然而事与愿违,随着工作岗位保护措施的日益扩大和费用的不断提高,该举措也发生了异化。如今企业要解雇职工,就要花费一大笔解雇费,所以企业宁愿放弃扩大再生产,甚至减产也不愿去冒万一经营不善要解雇职工所需高额费用的风险。于是就出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自1973年以来德国就没有再净增过任何新的就业岗位。^[7]这说明,德国对解雇采取过分保护措施带来的不是失业的减少,而是失业的增多。美国则不同,它在最近25年中创造了40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从而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就业状况。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福利体制对私人储蓄、

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影响也很大,因而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正是德国社会福利体制中的高福利、高税率、高成本和高额解聘保护恶化了德国国内的投资环境,吓跑了众多的国内外投资者,造成外国资金不内流,本国资金向外流的尴尬局面。以1996年为例,德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为170亿马克,而对内投资仅为2亿马克,相差85倍。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低投资必然带来低增长。对比一下50年代和90年代德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我们就可得出相应的结论。从1951年到1957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依次为10.4%,8.9%,8.2%,7.4%,12%,7.3%和5.7%。进入70、80年代这一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到了90年代则大幅度下降,从1992年至2000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依次为2.2%, -1.2%, 2.3%, 1.7%, 0.8%, 1.5%, 2.2%, 1.5%和3%。回顾德国福利和增长的全过程,人们看到的是一条令人深思的轨迹:福利费用同增长幅度大体上成反比,福利费用的上升带来的并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下降。

事实是严酷的,尽管多数德国经济学家至今也不愿意承认德国经济得了“德国病”,但也不得不惊呼:国家和经济已跌入“社会福利国家陷阱”。^[8]

建立并发展社会福利保障本是一件大好事,但搞得过急、过多同样也会走向反面。当人们在赞誉德国社会福利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在这方面德国在给世界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其沉痛的教训。显然,这一点对于正在进行福利体制改革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德国病”能治愈吗?

“病”和“死”是既有联系又不等同的一组矛盾。在这里谈“德国病”能否治愈同谈资本主义能否“长生不老”是全然不同的两个命题。资本主义由于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是多“病”缠身,而且终究会因病入膏肓而“死亡”,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一生“病”就不能治愈,就注定会因此死亡。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数百年里,它已病过很多场,但大多得到了治愈,而且在近数十年内有了新的发展。讲清这一点既是向真理的回归,也是实事求是研究“德国病”能否治愈的前提。

应该说,德国经济得了病是个不争的事实,大凡具有正常理智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很容易看清的。但

看清是一回事,治疗却是另一回事。从看清到治疗到治愈不仅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且路上潜伏着无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体制问题,是芸芸众生赖以维计的福利问题,这对“一个党在台上,一个党在台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说来是一个“生死抉择”问题,因为只要一触动福利这一敏感问题,就会丢失选民,就会导致执政党倒台。施罗德算是吃了豹子胆,一上台就试图触动这一问题,结果一下子就丢掉了6个州、市的执政大权。如果不是联盟党自不争气,自乱阵脚,施罗德早已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甚至能否执政到任期满都令人怀疑。今天提出这一论点既说明治疗“德国病”的难度,但也说明治愈“德国病”的可能。

出路在改革,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出路在“转轨”,就是说,德国不仅东部有体制转轨问题,西部也有体制转轨问题。而“改革”和“转轨”虽说历来都是困难的,但又都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把握其根本的规律,那就是:

1. 努力达到社会的共识,包括各主要政党之间以至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共识。要让人们知道,长痛不如短痛,只有经过“短”痛才能治愈“德国病”。其实,当今德国政坛朝野两党之间对德国面临的问题看法基本类同,应对的措施也是相似的,只是因为党派之别,才相互攻击。但近年来人们已经看到了一种新的动向:社民党不再象往常那样,一定要寻找“另一种选择”,而是敢于使用联盟党的方案,尽管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联盟党也采取了相应的“边批边放”的做法,在《节支计划》中人们对这一新动向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另一方面施罗德政府也加大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特别是工会和雇主协会之间在解决重大敏感问题上合作的力度,大力提倡“社会进行对话并达成共识的积极性和能力”,^[9]而成立由政府、经济界和工会高层代表组成的“劳动、培训和竞争力联盟”则是一个突出而典型的范例。

2. 要对症下药,逐步削减福利费用,尤其是附加工资,要逐步削减劳动成本,降低税率,减少国债,同高失业作斗争,以吸引投资,推动增长。

3. 要进行这样的改革或转轨,社会上很快就会出

现得益者或部分得益者,失益者或部分失益者。一定要特别注意,即使在初期也要使改革的整体得益者尽量多于改革的整体失益者。人们已经看到施罗德政府在决定降低附加工资的同时,降低起征税率,提高起征税额,提高子女津贴。在进行养老金改革时,则提高生态税来予以支持等等。

4. 要把握好改革中“渐变”和“突变”关系;要按轻重缓急来正确配置改革措施。在这方面人们已经看到了施罗德政府制定的一个又一个短、中、长期计划:例如一年的削减青年失业《紧急计划》,三年阶段《税改计划》,五年的《经济总体发展规划》,五年的《联邦财政计划》和七年的《节支计划》等等。

事情很清楚,施罗德政府不仅看到了问题,而且已在着手解决问题,但却受到德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和自身矛盾的严重制约。如能取得突破,“德国病”应该是可以治愈的。

[注释]

-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14页。
- [2] 艾哈德:《为大众谋福利》,杜塞尔多夫,1957年。
- [3] 赛康德:《争夺世界技术经济霸权之战》[M],铁道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 [4] 本文有关数据除特别注出者外,均引自历年的《数据报告》(Datenreport)和《经济年鉴》(Jahreswirtschaftsbericht)。
- [5] 经合组织,引自莱斯特·图罗夫的《资本主义的未来》[M],纽约,1996年版,第102页。
- [6] 联邦财政部2000年10月发布的《重要税收的国际比较》,引自www.bundesfinanzministerium.de网站。
- [7] 同注[3]。
- [8] 克里斯蒂安·封·克罗考夫:《德国的衰落》(Der deutsche Niedergang),斯图加特,1998年版。
- [9] 施罗德—布莱尔《伦敦宣言》第二章,引自www.yahoo.de网站,1999.10.16。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9)

收稿日期:2001-02-05